

# 学不由师传 理已臻极致

## ——廖彬宇传统文化学术思想刍议

□ 胡从经 文/图

十年前我第一次在时任中国新闻社社长郭招金处听说他的名字，那时廖彬宇年方二十，按郭社长的话说，就是“胸怀大志，气度不凡，进退有据，口吐珠玑。”郭社长对廖彬宇赞不绝口，他曾撰写并发表过一篇《天降其才耀中华》的文章向世人推介，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在听说他名字一年之后，我们认识了，我们是在中国文化研究院结缘的。

香港回归后，我与饶宗颐、梁振英等在董建华的帮助、支持下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文化研究院，我担任常务副院长。郭招金后来再度给我提到了廖彬宇，不过这次和上次不同，上次是泛泛一提，这次则是郑重向我推荐，说如果能请到他，对中国文化研究院定会有极大帮助。于是在郭招金的引见下我们见面了。

初次见面，我们谈话不多，却令我印象深刻。正如郭招金所言，廖彬宇果真是器宇轩昂，仪表堂堂。虽然年轻，却给人一种言谈时风度翩翩，静默时稳如泰山之感。在这之后我们又相约见了数面，谈话渐渐深入起来。交谈下来，我才发现，他对中华文化，尤其在儒释道易方面的造诣，已然融会贯通，且以中华文化思想来指点西学，从容大方、纵横捭阖、气象万千，其思想之精深博大，其见解之酣畅通达，令我生出一声叹为观止之慨。我以为如此才俊，一如中国人民大学李海彬教授所评价的：“既是非学不成，又是非学而成。”我后来特别向中国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许嘉璐、饶宗颐也专门介绍过他的情况。

后来廖彬宇接掌华夏文化促进会，出任华夏文化促进会驻会主席一职，还专门去了香港，聘请饶宗颐为华促会荣誉会长。孰料半年多后，饶老竟驾鹤西游，不然，以饶老之爱才，定会对他之人生成长有大裨益。华夏文化促进会是国家级文化类社会组织，廖彬宇年方而立，就成为该会领头人，按常理揆度，也是令人感到惊异的。廖彬宇令人惊异的地方还不止于此，他自19岁起在清华大学讲学以来，就连续做出了很多令人惊奇的成绩，之所以惊奇，是因为以他的年龄和在那种或恶劣，或孤独不被理解的环境下，还能够有所作为，这对常人而言，是几乎无法做到的。譬如他从19岁开始撰写《国学旨归》系列丛书；26岁就出版了200万字的《国学旨归》第一辑；27岁在北京朝阳区创办了占地百余亩的四观书院总部，先后率领书院的学员访问斯里兰卡并与总统会晤进行文化交流，访问英国并在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英国国会讲演中华文化；30岁，就已发表、出版了300多万字的学术论著。其举手投足，都无不彰显着中华文化自信……对此现象，中国政法大学李晓教授曾撰文评论他是智商、情商、灵商三商皆高的奇才。诚然，天下勤奋者不少，而既勤奋又能不断推出成果者则凤毛麟角。恐怕也唯有李晓教授这个评价能够解释了。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要传承，又要发展。光传承而不发展，是死学问；光发展而不传承，是毫无根基的标新立异。传承是执古之道“为往圣继绝学”，发展是切合现实“御今之

有”“为万世开太平”。能将传承与发展都做到，而且还做好的，实不多见。

廖彬宇30岁时出版的《平心平天下》，在学界引起一定的震动，好评如潮。洋洋四十万言的《平心平天下》虽然是一部集演讲、随笔、诗词和对联的集子，却“形散而神聚”，从始至终贯穿着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无论是他的演讲、随笔还是诗词对联，都能让读者真切感受到中华文化那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和意味，让你发现中华文化自成体系，这也许是这部书的独特风格。将这些在不同场合根据不同需要所做的不同演讲通览以后，读者更会惊奇地发现，廖彬宇用数字一到十给中华文化做了一个系统的理论架构。

今日很多学者，在讲述中华文化时，大都能够从某一点切入进去，然后无限地展开，很多听众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然而在听完以后，也差不多又都忘了，中华文化具体讲了些什么？又都说不上来。也许廖彬宇正是怀着一种“六经责我开生面”的使命感，总是能够别出心裁，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十字理论架构”可谓《平心平天下》一书最大的特色，也是贡献给现代传统文化事业最大的成果，不仅能够迅速把中华文化讲清楚，而且让人读完以后，油然而生一种强烈的文化自信，给人以醍醐灌顶之感，认识到中华文化既是经世致用之学，更是内圣外王之道。

廖彬宇新出版的《大成之道——中国精神的气质气度气势与气象》这本书是根据他讲《论语大义》的录音整理。很多人讲《论语》，多半是照着讲。要怎么注解，要怎么翻译。而廖彬宇却如同孙悟空，一个筋斗云翻了十万八千里，直接跳出来，把《论语》竟然讲成了一个系统的大智慧、大学问。这就是“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区别。

廖彬宇把《论语》的智慧归结为三十一一个“知”。他说：“谋大业，建大功，成大事，必须拥有大智慧。这个大智慧，就是‘大良知学与大成之道’。”孔子这一生就是向世人证明了，如何从一个无知少年，成长为大智慧的大成至圣，我们要想获得大智慧与大成就，从孔子上身，就能获得借鉴和启迪。

孔子是“十有五而有志于学”，15岁开始立下大志，希冀通过学习求得大智慧，这就是“知志”；立定志向以后，就自然会努力学习，就是“知学”；在知学的过程中，就会明白诚意正心学的重要，就会“知诚”；知诚，就能感悟心之本体，可以“知

心”“知仁”；能知心，就能通《易经》之道，可以“知易”；能知易，便能感悟天道，可以“知天”；能知天，就能读懂万物发展之规律，乃至人类命运之态势，就能“知命”；能知命，就能知生命之来处，可以“知本”；能知本，就进一步更好地认识自己，可以“知己”；能知己，就能发现自性，不假外求，能够“知足”；能知足、知天、知命、知足，就可以洞悉事物发展的规律，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可以“知常”；能知常，就能在事物开始时看到结果，可以“知因”；能知因果，就会对天道自然产生敬畏，进一步加强自身的修为，就会“知敬”；能知敬，不是懦弱，故对举为“知勇”；能知敬，则会于万物有所领会，可以“知觉”；能知觉，就能“知几”、还能“知名”、知时；能知几知时，知进退，就能“知行”；能知时知行，必能“知权”；能知权，亦必当“知中”；能知权，必能“知重”；知重者，可以“知谦”；知谦者，则“知礼”；能知重知谦知礼，则能“知德”；知德，则能“知容”；知德，必能“知言”；知言，必能“知人”；知德知言，则能“知趣”；有以上诸多之知，则必受大益，可以“知行”；最后便能“知政”，可以经济天下。

这里的“知”，不仅仅是一般知道、晓得的意思，还包含了把握、掌控、主宰的含义。如古时官职的知县、知府、知州等，分别指主管、掌控某县、某府、某州的官员。知客又是指主管招待宾客的人。所以，我们说“知”时，指既能了解又能把握时机；知本，是既理解又能抓住根本，照此类推。

这三十一一个“知”，他都细细地讲，使人知道，每一个“知”，都有极为丰富的内涵，都蕴藏着大智慧。让人感受到，中华文化如同物理学所形容的全息理论，“每一滴水都反映一个太阳”。廖彬宇的每一个“知”，都冠以“伟大”二字作为标题，如“知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子，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

百余年来，中华文化遭到了巨大的误会、被扭曲、歪曲，廖彬

宇自幼学习传统文化，也遭受过巨大的委屈，所以他有这样的感同身受，他就有这样的理想和追求，要为中华文化正名，不仅要正名，同时要让所有人知道，中华文化的智慧是伟大的，思想是光明的、格局是正大的，只要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个人能够幸福、民族可以强大、国家可以文明和谐。

针对一些人对儒家的误解，他提出了“儒家的三重境界”，用三句话就创造性地给儒家文化做了定义和诠释。他说：儒学的构成，一个“人”，一个“需”，就代表了儒家的三重境界，即文化儒、君子儒、大人儒。

第一、儒家文化好比阳光空气和雨露，须臾不可离，是人类之需。儒家文化为人类揭示了一条正确而光明的道路，只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就必定获得成功、取得成就。所以儒家文化，是人类需要的文化，这就是文化儒。

第二、儒家文化需要你做人。合格的人，叫作君子。君子以下，叫作小人，甚至“禽兽”；君子以上，叫作大人，或者“圣贤”。“君子”是一个合格的人的标准。孔子一上来不给你说做神，因为离人太远，一方面容易把大部分人给吓跑，另一方面要做神就要对自己要求极高，男女之事就免谈了，吸风饮露正常东西也不吃了，一般人做不到，所谓“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所以儒家让你做人，把人做好，也谈男女之事，但是合乎礼法；也谈吃的，但是不暴饮暴食，甚至吃得更讲究、更健康、更精致、更养生。这个“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个很好做到，只要把度收敛一点，就成君子了。这个度过分了，就是小人。所以君子很好做，一旦成为君子，行为就是优雅的，为人就是谦和的，君子尊重人，也受人尊重。这就是君子儒；古人云：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子，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

第三、一个人一旦在生活上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就是君子。而真正养成了习惯，那么就不再满足于这一点要求，对自己的要求自然会提高，就会有更高的追求，接下来就会追求成为圣贤。圣贤就是立“人极”的人，为世人做榜样，能够引领社会正向

发展的人。这就是大人儒。

廖彬宇还提出西方文化所谓的自我、本我和超我，就是孔子所说的小人、君子和大人。进而他又结合现实，提出儒家文化颇类于共产主义，儒家的君子就类于共产党员，儒家的大人就类于共产党所说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还在书中用了大量文字系统地论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内在关联，讲清楚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将必然进入中国，讲清楚了马克思主义主导中国是历史的选择、是正确的选择、是必然的选择、是伟大的选择。他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充分证明了共产主义社会有必然实现的内在逻辑，不是“乌托邦”幻想。他用《易经》的“三易”原则，讲清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变化的，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掌握并利用的”，而“三易”原则即“不易”“变易”和“简易”，“变易”就是世界和物质的运动变化，“不易”就是支配现象变化背后不变的规律，这个规律是能够掌握和利用的；“简易”就是掌握了这个规律以后，看待一切事物都变得简单了，可以这样这个规律创造事物并驾驭事物。

诚然，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与认知。千百年来，学易者多如牛毛，而能洞悉此中真义的人实在寥寥无几。

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刘大钧，是中央文史馆馆员，也是中国周易学会会长，创办了《周易研究》学刊，饶宗颐曾盛赞刘为“当代大儒”。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摩罗教授为廖彬宇写过一篇题为《立本守源，经世致用》的评介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记述：“廖彬宇同志学习习夏古代文献，是出于真正的热爱，可谓‘有志于学’。据了解，他上中学时，就特别喜欢读古文、背古文，心无旁骛，沉浸其中，不论经史子集，又或奇门秘要，以一种‘不易乎世，不成乎名，确乎其不可拔’的毅力，一方面探玄索隐、钩深致远，另一方面又不失于正、含章可贞。到后来竟然完全不按教学体制的安排学其他功课，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毅然决然退学，这说明其心性性与先民之大学颇为融通，从古人文字中，感应到了那种参赞天地、拥抱乾坤的大气魄、大精神，故一旦接触，就被强烈吸引。直至今日而学有所成，他依然不欲在教育体制内受‘学科’训练，更不欲取得‘体制化’的文凭或其他资格证书，对于今日的社会形式而言，可谓‘异

数’，可谓‘奇葩’。”

廖彬宇在书中说，《易经》最早提出了“和谐”的理念追求，所谓“保合太和乃利贞”，“和谐”有保合、太和、中和的境界，他在书中阐述，这“三和”就是马克思所阐述的三种社会形态，“保合”就是用物质保证社会的基本和谐，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和”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太和”代表了共产主义社会等。

廖彬宇认为《易经》在几千年前就提出出来了，最高的社会形态就是没有政府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都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并能运用这个高度的精神文明创造出高度的物质文明而把人从物质欲望中解脱出来，发展高度的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关系是相辅相成、高度和谐的。而马克思所揭示的共产主义社会所达到的就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高度和谐，共产主义社会的人都没有国家和政府，这样的状态，在《易经》里有一个形容，叫作“群龙无首”。就是说每个人都是一条龙，每个人都都很了不起，所以没有首领，也就是不需要政府了。而怎样实现这样的社会呢？共产主义提出出来的是让一部分先有了觉悟的人起来，做带头示范作用，带动更多的人共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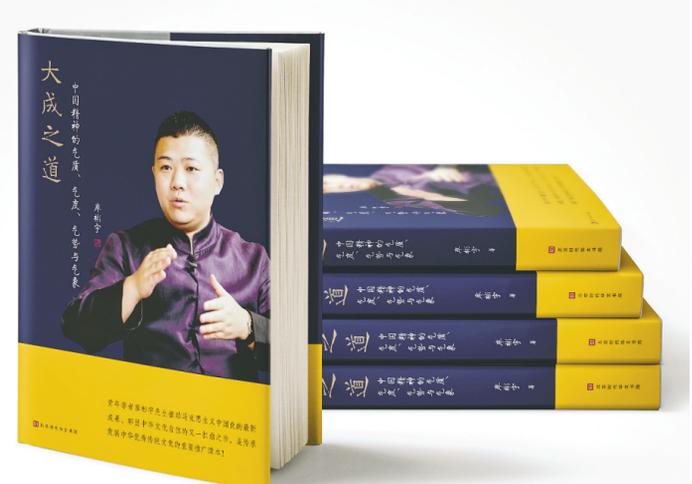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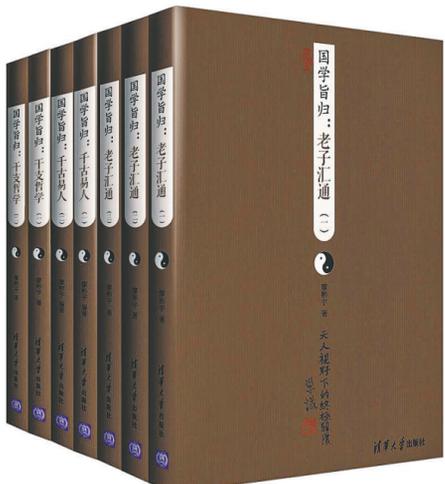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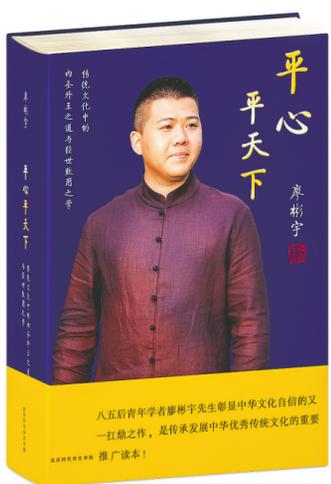
在寥寥无几。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刘大钧，是中央文史馆馆员，也是中国周易学会会长，创办了《周易研究》学刊，饶宗颐曾盛赞刘为“当代大儒”。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摩罗教授为廖彬宇写过一篇题为《立本守源，经世致用》的评介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记述：“廖彬宇同志学习习夏古代文献，是出于真正的热爱，可谓‘有志于学’。据了解，他上中学时，就特别喜欢读古文、背古文，心无旁骛，沉浸其中，不论经史子集，又或奇门秘要，以一种‘不易乎世，不成乎名，确乎其不可拔’的毅力，一方面探玄索隐、钩深致远，另一方面又不失于正、含章可贞。到后来竟然完全不按教学体制的安排学其他功课，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毅然决然退学，这说明其心性性与先民之大学颇为融通，从古人文字中，感应到了那种参赞天地、拥抱乾坤的大气魄、大精神，故一旦接触，就被强烈吸引。直至今日而学有所成，他依然不欲在教育体制内受‘学科’训练，更不欲取得‘体制化’的文凭或其他资格证书，对于今日的社会形式而言，可谓‘异

数’，可谓‘奇葩’。”

北京大学宫玉振教授曾赞叹廖彬宇：“未至弱冠，即已开坛宏师；甫及而立，复多传世大作。虽老师宿儒，亦自愧弗如。而更以传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其担当，其格局，其修为，其气魄，亦足令吾人敬佩敬仰。凡大国之兴，必始于思想；民族之魂，必在于文化。孟子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阳明至今，已足五百年之数。中华文化之复兴，其有待于廖彬宇及吾辈同道者乎！”

廖彬宇的理论架构，对于我们今天无论是做科学研究还是融通西方文化，抑或深入学习、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有助益。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源于大智慧。无疑，廖彬宇开启了大智慧，也建立了大格局。

注：胡从经，著名学者、教授。中国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历任上海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顾问教授、香港大学荣誉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特聘研究员、东京大学文学院外国人研究员。著有《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鲁迅与中国新文化》《榷茶集》《燹火集》《胡从经书话》等10余种。



廖彬宇系列丛书